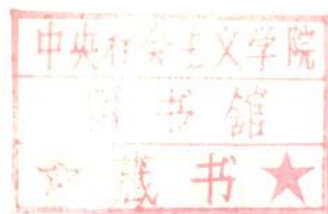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

(1941——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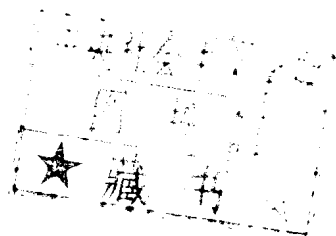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中国民主同盟简史

1941——1949

(征求意见稿)



D665-2

80.10



前 言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一九四一年成立，一九四四年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到今年已有四十年的历史。我们编印的这本《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征求意见稿）集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民盟简史；另一部分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八一年的民盟大事记。一九七九年本盟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曾编印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民盟大事记征求意见，现在我们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由于我们所搜集的盟史资料不足，加之编写水平限制，错漏之处一定不少，仅作为“征求意见稿”在盟内印发，希望同志们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以便日后修订增补，并为正式编写盟史作准备。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坚持民主团结抗战

(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 一、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间党派的初步结合..... (1)
-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3)
- 三、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7)
- 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及地方组织的建立..... (9)
- 五、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2)

第二章 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 一、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6)
- 二、反对内战..... (19)
- 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21)
- 四、坚持政协路线，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24)
- 五、调解东北内战..... (26)
- 六、李、闻血案..... (28)
- 七、中国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发展..... (32)
- 八、拒绝参加伪国大和伪政府..... (36)
- 九、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 (38)
- 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40)
- 十一、民主同盟发动和平运动..... (42)
- 十二、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广大盟员转入地下斗争..... (44)

第三章 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筹建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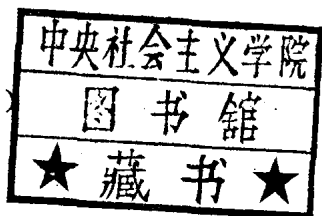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	(48)
二、反对国民党的“行宪国大”和声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	(52)
三、坚持国统区的地下斗争和解放区盟务的开展.....	(53)
四、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58)
五、揭露美蒋新的和谈阴谋和批判美国的白皮书.....	(61)
六、参加新政协与开国大典.....	(64)
结 束 语.....	(67)
注 释.....	(69)

第一章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坚持

民主团结抗战

(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间党派的初步结合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寇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当权的国民党政策的重点还放在抗日方面，也允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各党派都对国民党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接着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法令，将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一概取消，并且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活动，使得拥蒋抗日的中间党派对他不满意与失望。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又使手无寸铁的中间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并主张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①第四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和各中间党派的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

最后，国民参政会决定“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并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国民党政府，促成宪政。十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

第四次国民参政会议后，沈钧儒等二十五位参政员发起召开宪政座谈会，借重庆银行工会开会，到会的人很多，讨论得非常热烈。接着由座谈会中公推八十五人筹备组织宪政促进会。同时在重庆有三十几个妇女团体发起妇女宪政座谈会，青年团体代表二十五人发起青年宪政座谈会。成都、桂林、上海、延安等地先后成立了宪政座谈会及宪政促进会，各党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关于宪政的言论。宪政问题一时成为全国最注目的大事。但是，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蓄意破坏宪政运动。一九四〇年四月，国民党操纵的国民参政会议通过了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及其附带建议，以及反对设置国民大会议政会的意见，送交国民政府，结果不了了之。九月，国民党宣布：因交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召开日期另行通知，热闹一时的宪政运动就此收场。

在此期间，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后退出国社党）、胡石青，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的张澜、光升等，在重庆集会，拟订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信约》提出：“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同时又提出：“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拥护蒋（介石）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

反对”。简章规定：统一建国同志会设常务干事五至七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之，办理本会日常事务，每半年改选三至五人，并由常务干事中公推一人为主席，以轮流当选为原则。同时推黄炎培、梁漱溟将“信约”和会员名单送蒋介石。十一月二十九日，梁漱溟去见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允许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蒋介石提出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民主宪政运动广泛开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及其活动，使中间党派获得初步的结合，又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作了组织准备。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皖南事变^②发生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而且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一九四〇年五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演说，诬蔑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要在重庆发动暴动，命令军警特务监视沈钧儒等的活动。十二月下旬，国民党政府改组国民参政会，悍然取消国民参政会中不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增加了国民党的反动分子。一九四一年二月间，国民党又封闭了邹韬奋创办的桂林、昆明、成都、贵阳等地的生活书店，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

与国民党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的特点，提出了争取的政策。他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③中共中央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致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自中央局至省委或区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负

责进行各党各派及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的统战工作”。并规定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为“各党各派（从国民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生活教育社、乡村教育社）及各地方实力派，各种友军”。同时，中共中央又成立了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周）恩来同志负总责。以重庆为推动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动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明确规定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中都应吸收赞成抗日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容许资本家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工作者、记者、学者、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同共产党人合作，办报、办学、做事。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经常同民主人士接触，参加民主人士举办的聚餐会、时事座谈会，报告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遇事共同商量。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各中间党派的联合。

为了加强合作，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力争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勱、左舜生等一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一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罗隆基、章伯钧等连续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领导人，为盟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三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勱、左舜生、李璜、林可玑、丘哲、江问渔、冷遹、杨赓陶等十三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主要内容是：（一）“贯彻抗日主张，争取国家之独立自由，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迈进于宪政之途程”；（三）“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权限须为适当之划分”；（四）“军队属于国

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武力从事党争”；（五）“反对一切暴力斗争与破坏行动”；（六）“加紧经济建设，为有方针有计划之进行，渐进于社会主义，消除阶级斗争”；（七）“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障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八）“反对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九）“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反对一党垄断”；（十）“厉行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反对任何方面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十一）“国家财政收入应归国用，反对以国库充担党费”；（十二）“在法治下，反对一切政治性的特务机关”。这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的在当时政治形势下有一定进步性的政治纲领。

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李璜、江问渔、冷遯、杨赓陶、丘哲、林可玘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勱、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告秘密成立。沈钧儒原为同盟的创议人之一，但有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怕国民党反对，不同意沈钧儒和救国会参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公开盟的组织。三月二十八日，梁漱溟向中共中央在重庆的领导人周恩来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支持。五月二十日，梁漱溟到达香港后，在中国共产党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的海外组织的具体帮助下，开始筹备出版报纸。九月十八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十月十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经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经过修改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

言》，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十月十六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初步结合”，并认为同盟应“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时，由陈友仁、陈翰笙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的通讯社记者介绍，并由各国记者向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发消息。这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重庆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唯恐全国人民知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国民党各级报刊不准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和评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香港发表演说，诬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渝成立的组织是招摇撞骗，“在公在私俱绝无所闻”，“绝无其事”，并发动国民党在香港的报刊大骂民主人士为“第五纵队”，策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搜查《光明报》报社。正在这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黄炎培已辞去主席职务）、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于十一月十六日，邀请国共两党的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开了一次茶会，公开宣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接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罗隆基等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抗战时期正式中央民意机关”；“政府一切机关不得歧视无党或异党分子”；“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之自由”；“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等政治主张。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初期，从其组织成份来看：第一、大部分是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旧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少数人依附于反动统治阶级外，绝大多数人受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

剥削，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第二、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组织起来的，一九四二年，沈钧儒和救国会入盟，成为“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凡是加盟的党派的领导人都有两重党籍，既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又是另外一个独立政党的党员。盟的组织纪律对加盟的独立政党的领导人没有什么约束力，因此民主政团同盟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第三、中国青年党的盟员占的比例最大，盟的日常事务由青年党总部代办，青年党的盟员把持了盟务。这些特点，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展和斗争有很大影响。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势力政治力量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①，并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更好的前途。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热烈称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说：“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②

三、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的统治日益腐朽和反动，政治、经济和军事发生了全面危机。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统治日益不满，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宪政。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被迫作出“实施宪政”和在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并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推行假宪政。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允许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动一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参加这一运动，并吸收一切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战胜日寇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地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③周恩来的讲演，明确了宪政

运动的目的，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写信给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现在一切民意机关，都是由党部和政府指定和圈定，只有党意官意而无真正民意”，并提出要求彻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旬，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抨击国民党坚持法西斯统治的横蛮态度，强调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是不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必且十倍百倍于今天”。并提出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应放弃十年来的特殊地位，结束训政，无保留无犹豫地给人民以各项基本自由。

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纷纷组织民主宪政实施协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民主宪政座谈会。一月到五月，每月于重庆召开民主宪政座谈会，沈钧儒、黄炎培等联络广大民主人士讨论《五五宪草》，抨击国民党的寡头专政，要求“主权在民”。七月初，沈钧儒、邓初民、史良、陶行知等联合通电，主张立即动员民众，坚决抗战，铲除失败主义，并希望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一月中旬，张澜等于成都发起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决定倡导民主，促进宪政。四月初，民主宪政促进会对《五五宪草》中提出的总统制与内阁制、国会两院制等问题展开讨论。六月二十日，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大会，张澜等对国是提出十项主张，要求：（一）切实实行民主，“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民身体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结社集会之自由”。

（二）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构以必要的权力”，“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税等之弊端”。（三）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以保国家复兴之基础”。昆明于四月间举行宪政研究会，会议由周新民主持，到会发言的有褚辅成、张奚若、夏康农、徐炳昶等社会知名人士四十多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民主宪政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扩大

了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及地方组织的建立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特别是盟内无党派的盟员强烈要求改变盟的党派联盟的性质，以壮大盟的组织。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张澜、沈钧儒、张君勱、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潘光旦、朱蕴山等参加了会议，着重讨论了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的问题。

会议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改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取消“政团”二字，吸收无党派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

会议提出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六个方面，共四十六条。这些条文是民主同盟所主张的中国民主制度的具体化。

会议选举了张澜、张君勱、章伯钧、左舜生、潘光旦、罗隆基、李璜、沈钧儒、张申府、梁漱溟、陈启天、张东荪、鲜特生、杨叔明、黄良庸、曾昭抡、朱蕴山、周鲸文、曾琦、丘哲、张云川、周新民、韩兆鹗、林可玘、郭则沉、刘东岩、黄炎培、冷遯、张志和、余家菊、郑振文、吴晗、潘大逵等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勱、张东荪、潘光旦等十三人为中央常委，并推选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勱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盟的社会基础，大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加入民盟，极大地推动了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全国代表会议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加强对盟组织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在西南、西北、华南、华北发展地方组织，建立总支部和支部。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全国约有盟员三千人，其中无党派的盟员约占全体盟员的百分之七十。

云南省支部：一九四二年年底，盟中央派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罗隆基去昆明筹建云南省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正式成立，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等为委员，罗隆基为宣传委员，周新民为组织委员，潘大逵为青年委员，潘光旦为财务委员。接着，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吸收一批教授、教员、自由职业者入盟，扩大盟的组织。一九四四年春，中共南方局派遣党代表华岗同周新民商量决定组织西南文化研究委员会，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吴晗、楚图南、周新民、费孝通、冯素陶、李文宜等人参加，并建立西南文献研究室，出版进步书刊，协助民盟支部开展工作，推动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执行委员会组织简章，并决定改民盟昆明支部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推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吴晗为委员，罗隆基为主委，周新民为组织委员，潘大逵为宣传委员，吴晗为青年委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创办《民主周刊》，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组织简章，选举楚图南、冯素陶、费孝通、闻一多、潘光旦、潘大逵、王振华、杜迈之等为委员，楚图南为主委。全省约有盟员二百余人。

四川省支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在成都正式成立，李璜、李相符、杨伯恺、张志和、马哲民、沈志远、田一平等为委员，李璜为主委兼组织委员，田一平为秘书主任，马哲民为宣传委员，并建立了邛崃、南充、江津、大邑、内江等十余个县分部。全省约有盟员二千人，其中成都市约占一半。

重庆市支部：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开始筹建重庆市支部。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正式成立，何公敢、史良、陶行知、刘清扬、罗涵先等为委员会委员，何公敢为主委，史良为组织部长，陶行知为宣传部长，刘清扬为妇女委员会主任，并创办《民主星期刊》，作为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的机关刊物。全市约有盟员三百三十余人。

广东省支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后，原在香港工作的部分盟员回到广东，开展抗日活动。一九四四年九月全国代表会议后，盟中央指示李章达、丘哲等筹建广东省组织。接着，李章达、李伯球、张文等先后到达广东梅县，会同胡一声等成立核心小组，开始筹备工作。同年十月，在梅县东城召开民盟广东省代表大会。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推选李章达为代理主任，丘哲、张文、李任仁、何公敢为副主任，李伯球为组织部长，胡一声为宣传部长，杨逸棠为联络部长，并出版《曙光》，作为机关刊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改组为粤东干部会议，并成立了民主同盟广州市工作委员会。一九四六年三月，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支部正式成立，胡一声、周钢鸣、陈残云、章洪道、司马文森为委员，胡一声为主委。广东省的盟员大部分为教育界人士。

华北总支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派中央委员叶笃义等去北平筹建华北总支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叶笃义等到达北平，会同张东荪、张云川等开展筹备工作。一九四五年春，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张东荪、周鲸文、叶笃义、张云川、曾琦、林可玘等为委员，张东荪为主委，林可玘为组织委员，叶笃义为宣传委员。由于华北地区日寇控制严密，民盟开展活动颇为困难。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盟员陆续来到北平，建立了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刘清扬、吴晗先后任主委。

西北总支部筹委会：一九四二年夏，郭则沉到西安，与杜斌丞、王菊人会商建立西北民盟组织和开展民主运动。一九四三年在西安发展盟员，开展盟的活动。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中央委员

郭则沉为西北盟务特派员，去西安筹建西北民盟总支部。一九四四年十月，郭则沉到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等开始筹备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在西安正式成立，杜斌丞、王菊人、杨明轩、成柏人、李敷仁等为委员，杜斌丞为主委，杨子廉为秘书长，杨明轩为组织部长，成柏人为宣传部长，李敷仁为青年部长。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领导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民盟工作。约有盟员一百五十人，多为地方人士。

东南总支部筹委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后，梁漱溟等回到桂林，继续进行盟的活动。一九四二年，在桂林的救国会会员金仲华、胡仲持、千家驹、狄超白、陈此生、张锡昌等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增强了民盟的进步力量，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九月，桂林形势紧张，梁漱溟、陈此生到广西贺县联络地方民主人士开展抗日活动，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到昭平办《广西日报》。一九四五年春，民盟中央指示梁漱溟筹建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推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的民盟工作。接着，梁漱溟等在广西贺县八步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梁漱溟、陈此生、欧阳予倩、狄超白、千家驹、莫乃群等人为委员，梁漱溟负总责。由于交通阻塞，东南总支部的工作未能积极推进。

五、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民主同盟立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十月十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
（一）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二）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及宪法之制定；（三）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的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碍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与条例；（四）开放党禁，承认各党各派公开合法地位，并